



【短史记】

从孤女到皇后，真实的刘娥是什么样

□云韶

笔者小时候看过一部非常精彩的唐官剧，叫做《大明官词》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太平公主那三段凄婉的爱情故事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最近，《大明官词》的“姊妹篇”《大宋官词》上映，笔者抱着“崇敬”的心态收看了此剧。从一个历史系毕业生的角度来看，这部剧的槽点那是相当多。

比如，宋太宗的名讳问题。该剧有这样一段话，“宋太祖赵匡胤驾崩，其弟弟赵匡义即位，改名赵光义”。这话可谓漏洞百出，在陈桥兵变之前，宋太宗确实是叫赵匡义。但是，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，赵匡义这三个字便不能用了，因为他要避讳。史载，北宋建国之后，晋王赵匡义改名为赵光义。后来，烛影斧声，晋王得位，赵光义又改名为赵炅。因此，这句话的正确说法应当是，“宋太祖赵匡胤驾崩，其弟弟赵光义即位，改名赵炅”。此外，还有卢多逊竟然在赵炅活着的时候称其为“太宗”，宋朝的皇帝竟然看到了清朝才有的“奏折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虽然《大宋官词》槽点不少，但是其所讲述的故事还是不错的。刘娥，这位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皇后，值得细说。

按照《宋史》记载，刘娥的父亲叫做刘通，在宋初任侍卫步军司虎捷都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四年(979年)，刘通在征北汉时病死。不久后，刘娥的母亲也撒手人寰。十多岁的刘娥就此成为了孤女，家境更是一落千丈。

为了生活，刘娥不得不走出家门。她嗓音条件好，便走上了“卖唱”的道路。文艺工作者，现在很吃香，但是在北宋，这一行当却被人视作“不务正业”。为了果腹，十五岁的刘娥不得不嫁给了银匠龚美。

婚后，小两口到汴京闯荡，可惜两个年轻的外乡人根本无力竞争。眼瞅着从家里带来的钱越来越少，龚美决定“离婚卖妻”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刘娥竟然同意了龚美的要求。

刘娥被卖到了襄王府。襄王，是宋真宗赵恒继位之前的爵位。刘娥进府之后，凭借自己的灵巧劲儿，很快便得到了赵恒的宠爱，成为了襄王府中说不二的人物。地位的改变，让刘娥失去了敬畏之心，除了赵恒，王府中的其他人都不入她的眼中。终于，有一天，她碰上了一个“硬钉子”，赵恒的乳母刘氏实在看不惯刘娥作威作福的样子，直接绕开赵恒，找到宋太宗告状。宋太宗听到儿子身边竟然有如此轻浮之人，勃然大怒，命令赵恒马上将刘娥赶到王府之外。赵恒心中虽不情愿，但是皇命难违，只得将刘娥安置在亲信张者家中。后来，赵恒继位，他又把刘娥接回了宫中。

景德四年(1007年)四月，宋真宗的原配郭皇后病死。宋真宗想把刘娥立为皇后，遭到群臣的反对，只得作罢。刘娥虽然没有入主中宫，但是宋真宗给了她管理后宫的权力，戏文中有出戏，叫做“狸猫换太子”，便发生在这一时期。

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，家喻户晓，笔者就不在此赘述。这个故事虽然大部分情节为虚构演绎，但是故事的核心

“刘娥偷子”，却是历史史实。据史料记载，大中祥符三年(1010年)四月，官女李氏生子，刘娥取作己子，命杨妃抚养，取名受益。

关于刘娥偷子的原因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，刘娥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抢皇后的位置。真宗子嗣艰难，据说他曾对刘娥和李氏说，谁先生了儿子，谁就是正官国母。刘娥怕李氏抢先，因此待李氏生子之后，她命人将孩子抢出，诡称己子。后来，刘娥果然成为了皇后，至于李氏则郁郁终生，含恨而终。

这当然是小说家言。在古代，主人将奴仆的孩子占为己有，是很平常的事情。《红楼梦》里就有这样的例子，贾探春本是贾政与赵姨娘所生，但是这位三小姐，自始至终都把贾政的正妻王夫人，当做自己的母亲。对此，赵姨娘一点儿怨言也没有。同样的道理，也可用在赵受益、刘娥、李氏三个人身上。李氏虽然被宋真宗临幸生下了赵受益，但从身份上来说，她一直是官女，是刘娥的奴才。赵受益是真宗唯一的“龙种”，自然不能称一个奴才为母亲，这样做无异于“自降身份”。于是，刘娥便如王夫人一般，成为了赵受益法理上的母亲。而这也就是“刘娥偷子”的真相。

刘娥被立为皇后不久，宋真宗就开始生病。天禧二年(1018年)八月，在群臣的再三上表奏请下，宋真宗立赵受益为太子，并改名为赵祯。次年春天，宋真宗病情加重，时好时坏，朝政实际取决于刘娥。太子则成为了刘娥的摆设。

女主秉政，引发了朝野的不满。天禧四年(1020年)六月，真宗病情加剧，他和宦官周怀政商议，命太子赵祯监国，学习处理政务。见真宗有意将权力交给太子，早就对刘娥不满的周怀政非常高兴。他将此事转告给了宰相寇准，寇准听后大喜，趁着真宗清醒时敲定了此事。可惜，因为行事不密，在正式颁诏之前，被刘娥有勾结的枢密使丁谓侦知。丁谓迅速将这个消息传入了中宫，在刘娥的授意下，丁谓趁着真宗神志不清，奏请罢免寇准。真宗在迷糊之中，竟然同意了这项要求。寇准，这位真宗朝的“中流砥柱”，就此含恨离开汴京。

寇准离京，拯救赵家江山的重任落在了周怀政身上。经过考虑，周怀政决定联合朝野有识之士一起杀丁谓，废刘娥，拥太子继位。可惜的是，这个计划又被丁谓察觉了，周怀政含恨身死，寇准再次遭贬。整个朝廷，完全成为了丁、刘二人的玩物。

乾兴元年(1022年)二月，真宗病逝，太子赵祯继位，是为宋仁宗。刘娥成为了太后，军国大事完全由刘娥处置。从此，宋朝进入了刘太后专政时期，北宋中期就此开始。丁谓等为了讨好刘太后，决定次年的年号为天圣，其意为当政的是刘太后和皇帝赵祯“二圣人”。其后改元为明道，其意略同。

而刘太后专政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贬黜丁谓。两人之前的联合，是为了除掉寇准。如今寇准已被一贬再贬，丁谓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加之丁谓所作所为也引起了朝野的不满，刘太后就以此为借口，将丁谓贬到了海南。

丁谓下野之后，刘太后的宠臣变成了真宗时期“五鬼”之首的王钦若。当初，刘娥成为皇后，王钦若就出了不少力。刘太后专政以后，对王钦若始终是恩宠有加。天圣元年(1023年)八月，刘太后密诏时任江宁知府的王钦若进京，随后任命他为宰相。三年之后，王钦若病死在任上，刘太后命令工匠在茅山(今南京东南)为其塑像，“列于仙官”。

总之，在刘太后专政的十一年间，她所任用的宰相，基本上都是奸臣和贪官污吏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历代的史官却对她大加赞美，《宋史·刘太后传》就称赞道：“太后称制，虽政出官闈，而号令严明，恩威加天下”。但实际上，刘太后专政期间，因其奢侈无度，宠信佞臣，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明道二年七月，谏官范仲淹曾经指出：“近年赦宥既频，赏给复厚，聚于艰难，散于容易，国无远备，非社稷之福”。财政大臣三司使程琳也说：“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绌也”。以此可以看出，在刘太后专政期间，真宗末年的积贫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日益剧烈。对此，刘太后难辞其咎。



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职员合影，第二排中穿长衫者为张怡荪，后排左四为老舍。

【人物志】

记张怡荪先生

□张洪刚

张怡荪(1893—1983)，原名张煦，四川蓬安人。“五四运动”时期他在风起云涌的北大读书，毕业后先后任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讲师、教授。1932年8月至1936年8月到国立山东大学任职，臧克家、刘萃杰、徐中玉等皆是张怡荪在山大任教时培养的学生。而他和蔡元培的情谊也一直不断，1934年蔡元培在青岛小住两个多月，作为学生的张怡荪多次前去拜访。

1932年夏，国立青岛大学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。此时间一多离开山大，赵太侗遂邀请张怡荪接替闻一多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。张怡荪任职初期，正值山大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，他努力承担起巩固和发展中文系的重任，与同时到校的姜忠奎教授，及丁山、游国恩、闻宥、洪深、老舍等教授一起，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。

文、理两院合并，是国立山东大学的一大特色。文理学院以理为主，并以中文、外文两学系辅助全校其他学系的中、外文教学。这一做法曾得到教育部的大力赞许：“事属新创，用意尚佳。”张怡荪开设了国文学史、古代汉语、楚辞、音韵学、先秦诸子等课程。他的中国文学功底深厚，思维活跃，又富有幽默感，讲课很受学生欢迎。中文系1930级学生臧克家曾在《〈避暑录话〉与〈星河〉》中写道：“他很精练，也颇活跃。讲曹操的时候，能把《三国志》关于这位英雄、诗人的传略背得出来，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用爽朗声调背诵：‘沛国谯人也……’”

1934级学生徐中玉曾深情回忆：“我是1934暑后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的，去后才听说系主任是张煦教授……他谈得很熟，记得极清楚，口讲手划，流利生动，始终能使我们感觉学习有味。清人刘熙载曾说庄子的文章，思想特点都在一个‘飞’字，既富想象，又多变化，语多出人意料，却又着实吸引人。怡荪讲《庄子》这门课，至今想来，他正可说抓住了‘飞’的特点，讲到某些精彩的地方，他眉飞色舞，充满了感情，已深入‘角色’。这不是演员般的深入角色，而是学者对他们所讲之学的深有体会和对教学工作的热忱，这热忱表现在尽量把所讲所学之人的思想和艺术特点，通过他的教学直接给我们以感染，这种境界很难达到，一旦达到了便可使我们有心领神会，举一反三之益。”

在教学中，张怡荪特别注重基本功的训练。1933年9月27日，张怡荪“招中文系同人茶话会，议决大学诸生习文均用文言，并定曾选《经史百家杂抄》为一年级课本，《论语》及《史记论文》(康熙武进人吴见思评本)为诸生自课本。据徐中玉回忆：“中文系同学在中学里读古书不多，为培养读古书的能力，一年级时被指定课外诵读《论语》与《史记》两书，一定要上交自己重新标点过的这两本书，并写出简要的读后感。”学生们自行购置砚台、笔墨，以朱笔勾点这两部书。不少学生用了一年的功夫，就把这两部书及《集解》索

引和《正义》三家注释全部点完。学生们在断句过程中，自然会遇到不少难题，这就需要对照文章的词汇、语法及上下文意，反复琢磨、玩味、吟诵、辨析，而且边点边改，要吃很多苦头，但也确实长了不少本领。通过这种基本功训练，不仅提高了学生们阅读古书的能力，也培养了他们阅读古书的兴趣。张怡荪提出的这种培养、提高学生阅读古书能力与兴趣的传统方法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。

文人与酒一向渊源深厚，在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也不例外。当时，大学教授名士范儿十足，诗酒风流，被人称为“酒中八仙”。1932年杨振声、闻一多、方令孺先后离校，随后赵太侗、黄际遇、邓仲纯、老舍、洪深、赵少侯、萧涤非、台静农等人形成了新的饮酒圈子，即所谓的“后酒中八仙”。张怡荪与姜忠奎、游国恩、老舍等人的友情深厚，尤其是与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交往密切，二人经常书斋纵论、海边漫步、游览名胜、煮酒论文，在青岛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34年8月29日至11月10日，66岁的蔡元培在青岛小住两个多月，作为学生的张怡荪多次前去拜访。8月30日，蔡氏抵青的第二天，山大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和张紫维即前赴其寓所拜望，此“皆北大旧生而在山东大学任教职员者也”。张怡荪汇报了自己在研究藏文、藏学的进展情况。他告诉蔡元培，“自英文及日文各译藏文辞典一部，尚未印”，此后几次往来中，藏学问题成为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。9月1日晚，“赵太侗、俞珊夫妇招饮于顺兴楼，座有元任夫妇、邓仲纯、丁山、怡荪夫妇、梅宅等”；10月4日午，“律师于琦招饮顺兴楼，座有道充、太侗及姜忠奎等”；同日，“北大旅青同学招饮中山路青岛咖啡，先摄影，公推太侗致词。座间有人提议组织同学会，推赵、张(怡荪)、狄杨、王五君为筹备员”，也许这是北大青岛校友会的源头。1935年9月至10月23日，蔡元培最后一次来青岛。10月23日九时，蔡元培一家乘盛京船返沪。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夫妇等到码头送行。

1936年，山大学生们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，赵太侗校长因此屡次遭受教育部指责，地方政府减少划拨办学经费。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之下，赵太侗校长渐感“力不从心”，于1936年3月13日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。根据赵太侗的提议，校委会推举张怡荪、陈之霖、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，临时代行校长之职，主持校务。6月27日，教育部准赵太侗辞职，校务由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。

不久，张怡荪辞去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回到北京，组织成立西陲文化院，任院长。1941年接受了《西康通志》的总撰任务，1945年完成《西康通志》藏汉大辞典资料本。解放后，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，继续主编《藏汉大辞典》。后调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，四川民族研究所。1985年，《藏汉大辞典》正式出版发行。



宋真宗章献明肃皇后